

附件二

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

佩内洛普·赖丁斯女士撰写

1. 引言

1. “必要勤勉”义务在国际法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¹ 它是十九世纪在中立法和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方面的国家实践和仲裁裁决中发展而来。² 二十世纪的司法裁决推进了这一概念，并赋予其更为具体的形式。³ 司法裁决中的必要勤勉义务系建立在以下概念基础上：国家必须防止其领土被用于有损其他国家权利和利益或对其他国家造成危害的活动。国际法院在科孚海峡案中将这一概念表述为国家有义务不允许其领土被用于违犯其他国家权利之行为。⁴ 自 1980 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在司法上得到了更多承认。⁵

¹ 关于必要勤勉的历史沿革，详见：Giulio Bartolini,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Due Diligence Standard”, in Heike Krieger, Anne Peters, and Leonhard Kreuzer, *Due Dilig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3-41; Samantha Besson, *La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The Pocket Book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 Les livres de poche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https://brill.com/view/serial/HAPB>), vol. 46 (2021) pp. 33-71; Samantha Besson,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Hague Academy Special Editions) (2023) pp. 38-48; Jan Arno Hessbruegg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s of Attribution and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N.Y.U. J. Int'l. L. & Pol.*, vol. 36 (2003-2004), pp. 265-306; Awalou Ouedraogo, “La neutralité et l'émergence du concept de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l'affaire de l'Alabama revisité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2) (2011), pp. 307-346.

² 见：阿拉巴马号索赔仲裁案(美利坚合众国诉联合王国)，1872 年 9 月 14 日最终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九卷，第 125-134 页，见第 129 页，该案适用 1871 年《华盛顿条约》第六条所载规则，其中包括中立国政府应予践行的“必要勤勉”；Frederick Wipperman 仲裁案(美利坚合众国诉委内瑞拉)，1890 年 9 月 2 日最终裁决，Moore, *History and Digest*, 第 3 卷，第 3039-3043 页，见第 3041-3042 页。

³ 例如，见：英国在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财产案(西班牙诉联合王国)，1925 年 5 月 1 日最终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第 615-742 页；帕尔马斯岛仲裁案(荷兰诉美利坚合众国)，1928 年 4 月 4 日最终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第 829-871 页；William E. Chapman 仲裁案(美利坚合众国诉墨西哥合众国)，1930 年 10 月 24 日最终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四卷，第 632-640 页；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美利坚合众国诉加拿大)，1941 年 3 月 11 日最终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三卷，第 1905-1982 页；Moore 法官在“莲花号”案(法国诉土耳其)中的不同意见，1927 年 9 月 7 日判决，《1927 年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 辑，第 10 号，第 65-94 页，见第 88 页；科孚海峡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诉阿尔巴尼亚)，1949 年 4 月 9 日判决，《194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 页起，见第 22 页。

⁴ 科孚海峡案，前注 3。耐人寻味的是，该案的英文案文中“故意”一词，而法文案文则略去该词，表述为“各国均有义务不允许利用其领土从事违犯其他国家权利之行为”。

⁵ 例如，见：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案，实质问题，判决，《198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 页，第 67-68 段；在尼加拉瓜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实质问题，判决，《198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4 页，第 157-158 段；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第 241-242 页；Gabcikovo-Nagymaros 项目案，实质问题，《199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7 页，第 53 段；乌拉圭河沿岸的纸浆厂案，实质问题，《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4 页，第 101 段；

2. 在最泛泛的层面上，必要勤勉被理解为一项予以注意的责任或标准，应适用于危害其他国家权利和利益的一国在其领土上的行动或应受其管辖或控制的活动。必要勤勉常与国际环境法——尤其是与预防跨界环境损害之责——联系在一起。据国际法院认为，此项预防义务源于“国家在其领土上的应尽之责”。⁶ 从该法院的表述来看，必要勤勉义务的范围明显比上述在预防跨界环境损害方面的具体应用更广泛。例如，除其他外，保护外交和领事馆舍和人员⁷，以及一国未能防止应受其管辖或控制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害行为的情况⁸，也涉及到必要勤勉义务。

3. 或可将必要勤勉视为一项适用于国际法不同领域的一般法律原则——上述领域对于必要勤勉义务有具体的表述。事实上，多个具体的国际法制度中，都有评论者试图应用必要勤勉义务。这其中包括国际人道法⁹、国际海洋法¹⁰、国际网络安全法¹¹、国际组织法(其中涉及的是包括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在海外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问题)¹²，以及国际人权法(其中涉及的是国家保护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员免受伤害的义务)¹³ 和按照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实质问题，《201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65页，第104段；印度河水域基申甘加工程仲裁案，2013年2月18日部分裁决，常设仲裁法院，案件号2011-01，第449-450段；国际海洋法法庭，资助个人和实体开展“区域”内活动的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咨询意见，2011年，第41页，第110段；国际海洋法法庭，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问题委员会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咨询意见，2024年5月21日。

⁶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阿根廷诉乌拉圭)，前注5，第101段。

⁷ 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案，前注5，第67-68段。

⁸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判决，《200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68页，第246-250段，其中国际法院采用了“警觉”一词。

⁹ Antal Berkes, 'The standard of 'Due Diligence' as a result of interchange betwee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Security Law*, vol. 23(3) (2018), pp. 433-460; Marco Longobardo, 'The Relevance of the Concept of Due Diligence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7 (2019) 44-87.

¹⁰ 例如，见：国际海洋法法庭，“区域”内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前注5，第110-112段；国际海洋法法庭，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请求，咨询意见，2015年，第129段；国际海洋法法庭，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问题委员会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前注5。

¹¹ Michael. N. Schmitt (ed.), *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规则6和7；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政府专家组的报告，2015年7月22日，联合国文件A/70/173(网络安全报告)，第13(c)、28(a)和28(b)段。

¹² Ellen Campbell 等人，“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50(2) (2018) pp. 541-604；国际法协会，*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lin Conference (2004)；Nigel. D. White, “Due Diligence, the UN and Peacekeeping”, in Peters, Krieger and Kreuzer (eds.),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pp. 217-233；Regis Bismuth “The Emerging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Due Diligence Responsibi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William Blair, Chiara Zilioli and Christos Gortsos (e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Banking Law post COVID-1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330-351.

¹³ 例如，就保护妇女免遭暴力侵害而言，见 Opuz 诉土耳其案，欧洲法院(案件编号 33401/02)，判决，2009年6月9日。

导原则》管控公司的问题)¹⁴。此外，必要勤勉义务在诸如外空法、全球卫生¹⁵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等新的国际法领域也具有相关性。

4. 必要勤勉义务存在于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责任与国家在其领土内采取行动的主权权利之间相结合之处。¹⁶ 在当代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对于国家以及受其管辖或控制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和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有了更多的关注。对于国家有着行为标准方面的期待，即期待国家在事关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权利和利益时能合理行事。必要勤勉义务即体现了上述期待。

5. 虽说已在多个具体的国际法制度中触及了必要勤勉问题，但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义务仍存在着共有的特征，可从丰富的国家实践、司法裁决和理论著述中予以确定。过去曾尝试阐明上述共有特征，其中包括国际法协会所作的尝试¹⁷，但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采用系统方法仔细研究必要勤勉义务全部范围的空间。

6. 这样一项研究将从对国际法中必要勤勉问题日益增长的兴趣——尤其是学术著述中日益增长的兴趣¹⁸——以及提交国际级法院和法庭的诉状更频繁地诉诸于必要勤勉义务这一现象¹⁹当中汲取灵感。不过，国际法中必要勤勉之责的法律性质、范围以及内容并未明确界定。一个关于国际法中必要勤勉问题的专题，将就履行必要勤勉义务的必要要件为各国提供具体的指导。

7. 下面的章节首先讨论委员会过去开展的该专题相关工作(第 2 节)。这为审议所提议专题的范围和拟予处理的问题提供必要的背景(第 3 节)。接下来会考虑选

¹⁴ Jonathan Bonnitcha & Robert McCorquodale, “The Concept of ‘Due Diligence’ in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8(3) (2017) pp. 899-919; John Gerard Ruggie, & John F. Sherman III, “The Concept of ‘Due Diligence’ in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 Reply to Johnathan Bonnitcha and Robert McCorquoda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8 (2017) pp. 921-928.

¹⁵ Ahmed Alfatlawi & Azhar Al-Fatlawi,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due diligence and notification in light of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COVID 19 as a model” *Al-rafidain of Law*. vol. 24(79) (June 2022) pp. 72-110; Antonio Coco, Talita de Souza Dias, “Prevent, respond, cooperate: states' due diligence duties vis-à-vis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vol.11 (2020), pp. 218-236.

¹⁶ 见仲裁员 Max Huber, 帕尔马斯岛案(荷兰诉美国), 前注 3, 见第 839 页: “领土主权……涉及展现一国之活动的专属权利。该项权利必然伴随着一项责任, 即在领土内保护其他国家权利之义务……。”

¹⁷ 国际法协会, Duncan French (主席)、Tim Stephens (报告员),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研究组: 第一次报告》(国际法协会报告), 2014 年; 国际法协会, Duncan French (主席)、Tim Stephens (报告员),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研究组: 第二次报告》(国际法协会报告), 2016 年。

¹⁸ Besson, *La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supra n. 1; Besson,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supra n. 1; Krieger, Peters, & Kreuzer, *Due Diligence*, supra n. 1; Joanna Kulesza,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6); Alice Ollino,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Societe Francaise pour de Droit International (SFDI)/Sarah Cassella (eds), *Le standard de due diligence et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Paris: Pedone, 2018).

¹⁹ 例如, 见: 向国际海洋法法庭作出的书面陈述和口头陈述, 国际海洋法法庭, 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问题委员会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

定专题的标准(第4节)以及该专题的产物可能采取的形式(第5节)。还提供了一个精选参考书目。

2. 委员会过去开展的与所提议专题有关的工作

8. 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系建立在委员会过去工作的基础之上。一个关于国际法中必要勤勉问题的专题，将会补充而非减损上述此前开展的工作。²⁰

9. 在1949年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将国家责任专题列入了选定编纂的专题暂定清单。²¹

10. 继特别报告员罗伯托·阿戈提交第二次报告后，委员会决定分开审议国家对合法活动的责任和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并决定先处理后。者。²² 此举部分原因在于，“所谓的风险责任”依据不同，使得难以同时审议这两个主题。²³

11. 特别报告员罗伯托·阿戈在其第四次报告当中，在关于私人当事方行为归责问题的第11条草案中提出了必要勤勉问题，并详细列举了保护外国人方面的国家实践。²⁴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七次报告当中，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中进一步提出了国家疏忽概念——尤其是借由第23条草案²⁵，还借由第20条草案和第21条草案就行为义务和结果义务作出了区分²⁶。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在其第二次报告当中对罗伯托·阿戈的分类表示了相当的谨慎。²⁷ 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二读时，放弃了上述分类。²⁸ 委员会在完成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时，将必要勤勉之责置于主要规则层次上，将其视为一项依情境不同且根据产生初级义务的规则而各异的标准。²⁹

12. 委员会就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开展的工作，始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之前，不过二者最终是同步完成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第一任特别报告员罗伯特·昆廷-巴克斯特将该专题

²⁰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就必要勤勉与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开展的工作的描述，见：Kulesza, *Due Diligence*, 前注18, 第115-220页。

²¹ 《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第49-50页，第27-32段。

²² 《197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178页，第6段。

²³ 同上，第二卷，第178页第6段和第306页第66段。

²⁴ 《197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95-126页，第61-146段。另见《国际责任：特别报告员弗兰西斯科·V·加西亚·阿马多尔的第二次报告》，《195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121-130页。

²⁵ 《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2-37页，第1-19段。

²⁶ 《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20页，第1-46段。对阿戈区分行为义务和结果义务这一处理方法的评论，见 Paul-Marie Dupuy, “Reviewing the Difficulties of Codification: On Ago’s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of Means and Obligations of Result in Relation to State Responsi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1999), pp. 371-385.

²⁷ 《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29页，第80-92段。

²⁸ James Crawford,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General P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26-232.

²⁹ 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及评注》，《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总评注，第31-32页，第1-4段。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针对关于必要勤勉问题应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框架内处理的建议作出的慷慨激昂的答复，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第181-183页，第51-71段。

立足于以下认识：有些活动在原则上是有益的、正当的，因而不应予以禁止，但这些活动会造成一定跨界损害或带来造成此类损害的风险。³⁰ 最初，他有意将该专题广泛适用于一国领土或管辖范围内进行的造成伤害或损害的活动。³¹ 但是，委员会决定将之局限于物理环境。³²

13. 委员会继续作为一个专题讨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问题，直至 1997 年将该专题分成了两个部分：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和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造成损失情况下的国际责任。³³ 在预防框架内讨论了必要勤勉问题³⁴，并将其定性为预防跨界损害之责的一项核心内容。³⁵ 事实上，关于预防跨界损害的条款将预防义务与必要勤勉义务相提并论。³⁶ 上述条款在环境领域超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框架内赋予了必要勤勉义务一些内容³⁷，但其适用范围有限。

14. 必要勤勉与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让委员会思考了数十年之久。最初是昆廷·巴克斯特作为一项核心因素提出了作为预防义务的一项功能发挥作用的注意之责或必要勤勉之责。³⁸ 后来，他放弃了“注意之责”短语，因其“有太多言外之意，没有理由将其保留在本专题的用语当中”。他此举的部分理由是，该短语即便是在适用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时，也是在暗示着某种标准——忽视该标准将引发国家对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而这不在该专题范围之内。³⁹ 他重申了委员会的决定，即“本专题属于‘主要’规则范畴，即受既有

³⁰ 特别报告员罗伯特·Q·昆廷-巴克斯特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第二次报告，《198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22-123页，第78-93段；特别报告员罗伯特·Q·昆廷-巴克斯特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第四次报告，《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02页，第2段。

³¹ 昆廷-巴克斯特的第四次报告，前注30，第202页，脚注8。

³² 特别报告员彭马拉朱·斯雷尼瓦萨·拉奥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境损害的第一次报告，《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93页，第71段。

³³ 联大决议，《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A/RES/52/156, 1998年1月26日。

³⁴ 欲回顾委员会此前就该专题开展的工作，见特别报告员彭马拉朱·斯雷尼瓦萨·拉奥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境损害的第一次报告，《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86-193页，第32-70段。

³⁵ 特别报告员彭马拉朱·斯雷尼瓦萨·拉奥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第二次报告，《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16-121页，第18-49段。

³⁶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总评注，《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页，第2段。尽管如此，克劳福德曾解释说，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未能采取行动即会违反必要勤勉义务，无论所禁止的事件实际上是否发生，而就预防义务而言，必须是未能采取举措且事件确有发生，克劳福德，《国家责任》，前注28，第231-232页。

³⁷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总评注，《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条评注，第154-155页，第7-18段。

³⁸ 特别报告员罗伯特·Q·昆廷-巴克斯特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第二次报告，《198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19-123页，第68-72段和第90段。

³⁹ 特别报告员罗伯特·Q·昆廷-巴克斯特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第三次报告，《198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5-57页，第19-23段。

的国家对不法行为或不作为的责任制度制约而非与之争锋的规则”⁴⁰。但尽管如此，注意之责随后出现在该专题第二任和第三任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当中。⁴¹自那时以来，必要勤勉在国家责任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一难题，一直充斥在有关必要勤勉之责的考量当中。⁴²

15. 必要勤勉之责还出现在委员会其他工作产物当中，包括水道的非航行使用相关产物在内。⁴³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7条草案把必要勤勉作为使用国际水道的一项核心要素，以避免对国际水道部分位于其领土内的其他国家造成重大损害。⁴⁴在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草案当中，第9条涉及减少灾害问题，系受到国际环境法原则的启发，其中包括必要勤勉在内。⁴⁵关于保护大气层的指南草案内含各国通过践行必要勤勉保护大气层的义务。⁴⁶最近，委员会在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原则草案中谈及了必要勤勉问题，其中原则10谈到企业在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开展活动时须履行应尽职责。⁴⁷

16. 上述盘点表明，必要勤勉之责在委员会过去的工作当中占据了显著地位。但是，委员会从未将该项义务作为一项适用范围不止于环境损害的单立义务予以全面处理。委员会对该项义务轮廓的考量并非总是一以贯之。这使确定该项义务的范围和核心内容变得困难。此外，该项义务在责任的初级义务和次级义务之间，位置也有些尴尬。所提议的专题将补充委员会此前的工作，并处理委员会迄今未涵盖的问题。

3. 所提议专题的范围和拟予解决的问题

17. 该专题将致力于澄清必要勤勉义务的法律性质、范围和内容。必要勤勉通常被指称为一种“责任”或“义务”，而其内容要根据其所描述的主要义务的内容以及有待保护的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来确定。⁴⁸它被指称为一种据以对一个

⁴⁰ 特别报告员罗伯特·Q·昆廷-巴克斯特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第四次报告，《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203页，第7段。

⁴¹ 见：特别报告员胡利奥·巴尔沃萨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第二次报告，《198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49页，第18段；特别报告员彭马拉朱·斯雷尼瓦萨·拉奥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第二次报告，《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19页，第32段。

⁴² 例如，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第181-183页，第51-71段；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先生与哈夫纳先生和辛马先生就必要勤勉问题进行的讨论。

⁴³ 见特别报告员斯蒂芬·麦卡弗里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第四次报告，《198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37-243页。

⁴⁴ 《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3-104页，第7条草案评注，第3-9段。

⁴⁵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草案及评注(2016年)，联合国文件 A/71/10，第9条草案评注，第4段。另见第16条草案，其中规定受灾国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提供外部援助的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得到保护。

⁴⁶ 保护大气层指南草案及评注(2021年)，联合国文件 A/76/10，指南3草案。

⁴⁷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原则草案及评注(2022年)，联合国文件 A/77/10，原则10草案。

⁴⁸ Besson, *Due Diligence*, 前注1, 第65页。

国家在履行其主要义务方面的行为表现进行评估的行为标准。⁴⁹ 它还可能被视为一项在国际法不同领域均有体现的一般法律原则。⁵⁰ 取决于使用语境，“必要勤勉”一词可能有不同的含义。⁵¹ 为了更清楚地勾勒该专题的轮廓，将以国际法院在科孚海峡案中所阐明的义务作为必要勤勉义务的核心，即一国不应允许利用其领土从事违犯其他国家受国际法保护之权利和利益的行为。⁵²

18. 该专题的目的，将是通过发现既可泛泛适用于国际法又可适用于国际法具体制度的必要勤勉义务共有要素，来确定国际法中必要勤勉义务的法律性质、范围和内容。该专题将通过分析国家实践、司法裁决以及国际法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有关必要勤勉的理论，勾画出必要勤勉义务的规范轮廓，目的是确定必要勤勉无需视其所涉主要义务而定的核心特征。此举将为采用演绎推理法创造条件，即从这些单独的要素中演绎出系属必要勤勉共有特征的要素。一些评论者曾对是否存在关于必要勤勉的一般制度提出质疑⁵³，但尽管如此，另有评论者已阐明了此种制度存在的可能性。⁵⁴

(a) 所提议专题的标题

19. 所提议的专题题为“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采用通用术语“必要勤勉”，而非其任何要素，是有意为之。此举使该专题可集中着眼于必要勤勉的共有内容，且不妨碍发现其任何具体含义。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该专题将处理必要勤勉问题，无论是作为一项义务、一项责任还是一项原则。但是，该专题不会直接处理国家责任方面的问题。提及“国际法”，表明该专题处理一般国际法框架内的必要勤勉问题。

(b) 所提议专题的范围

20. 本节考虑有关该专题范围的问题：必要勤勉的法律性质、范围和内容。本节还试图通过排除对于该专题的主要目标而言无关紧要的某些问题来限制该专题的范围。

⁴⁹ Riccardo Pisillo-Mazzeschi, “The Due Diligence Rule and the 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5 (1992), pp. 9-51 at p. 42;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研究组，第二次报告，前注 18; Caroline Foster, *Global Regulatory Standards in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Disputes: Regulatory Coherence, Due Regard, and Due Dilig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99-129.

⁵⁰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研究组，第二次报告，前注 18，第 6 页。

⁵¹ 例如，见：国际法院在波斯尼亚灭绝种族案当中作为界定防止灭绝种族之责范围的一项标准使用了“必要勤勉”，《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质问题)，判决，《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3 页，第 430 段。

⁵² 科孚海峡案，前注 3。

⁵³ 见 Riccardo Pisillo Mazzeschi, “Le chemin étrange de la due diligence: d’un concept mystérieux à un concept surévalué”, in SFDI (ed.), *Le standard de due diligence et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Journée d’études franco-italienne du Mans*, (Paris: Pedone, 2018) pp. 323-338.

⁵⁴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研究组，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前注 18; Robert Barnidge, “The Due Diligence Princip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vol 8 (2006), pp. 81; Awalou Ouedraogo, “La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règle de la neutralité au principe general”, *Revue Général de Droit*, vol. 42 (2012), p. 641; Besson, *La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前注 1; Ollino,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前注 18.

(1) 必要勤勉的法律性质

21. 必要勤勉作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或习惯国际法义务，其法律性质或法律基础是不明确的，其与《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子)项至(寅)项所规定的法律渊源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并不明确。有时，它会被指称为一项“国际法原则”，意指一项适用于整个国际法的一般行为标准。⁵⁵ 而另一方面，其作为一项原则的地位曾遭质疑。⁵⁶ 理解必要勤勉之责的法律性质，可能有助于考虑如何在一般国际法和国际法的具体领域内予以适用。同样，在具有正统地位的国家责任条款中，必要勤勉是主要规则的一项内容。无论如何，它与因违背义务而产生的次要规则责任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正统的国家责任框架内以及行为义务和结果义务的二分法框架内理解必要勤勉⁵⁷，可有助于更好地领悟其性质。

(2) 必要勤勉的范围和内容

22. 该专题将寻求确定从对国际法具体领域内与必要勤勉义务有关的国家实践、司法裁决和司法学说的盘点当中收集到的必要勤勉的共有内容。该专题将审视与必要勤勉义务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以下问题：

- 是否存在会产生必要勤勉义务的专门涉及必要勤勉标准而不取决于某种特定义务的情况；
- 有关国家的国情或能力所具有的相关性，以及有关国家对损害来源的掌控程度；
- 必要勤勉之责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可变的程度和性质；所要求的注意或警觉程度，或者说不疏忽程度；
- 触发必要勤勉义务之前是否存在最低的损害风险水平，以及损害严重到何种程度会触发必要勤勉义务；有关损害风险的相关必备知识和可预见性方面的问题；
- 国家活动和应受国家管辖或控制的非国家行为体活动相关行为标准的合理性，包括将必要勤勉义务视为一项客观标准来考虑。

23. 该专题不会囿于地域，而是会根据必要勤勉所涉主要义务的情境予以广泛适用。必要勤勉所适用的地域范围将包含涉及国际社会权利和利益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3) 限制该专题的范围

24. 鉴于必要勤勉义务见于多种制度，有必要明确界定该专题的范围。

⁵⁵ Kulesza, *Due Diligence*, 前注 18, 第 272-6 页; Barnidge, “The Due Diligence Principle”, 前注 54; Ouedraogo, « La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 (2012), 前注 54。

⁵⁶ 见 Neil McDonald, “The Role of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68(4) (2019), who bases this in part on the non-legal policy considerations that may condition a State’s conduct; Heike Krieger & Anne Peters, ‘Due Diligence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Krieger, Peters, Kreuzer, *Due Diligence*, 前注 1, 第 371-376 页。

⁵⁷ 见 Ollino,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前注 18, 第 64-130 页。

25. 该专题将处理国家的必要勤勉义务。该专题不会涵盖国际组织在进行内部程序时可能须要践行的必要勤勉⁵⁸，也不会涵盖跨国公司、企业经营者、私人投资者或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可能须要践行的必要勤勉⁵⁹。必要勤勉对国际组织的适用性不同于对国家的适用性，因其法律和机构架构多种多样，且其控制程度和机构自主权也各不相同。⁶⁰ 在某些情境中，必要勤勉可被视为诸如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就其投资或活动发现、评估和管理相关风险的过程。⁶¹ 鉴于上述差异，也鉴于将必要勤勉适用于不同行为体时的共有特征难以确定，适用于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必要勤勉不在所提议的该专题范围内。

26. 该专题将不包含必要勤勉在特定情况中的适用或实行问题，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必要勤勉所涉主要义务的内容。同样，该专题不会对必要勤勉涉及的各个不同的主要义务进行微观分析，因为关注重点是必要勤勉，而不是主要义务。

27. 必要勤勉义务的程序化现象，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已变得尤为多见，在国际人权法领域也有体现。⁶² 必要勤勉被视为蕴含着特定的程序性义务，例如通知、共享信息、协商、合作、评估和监测。但是，上述程序性义务的性质和范围取决于相关的主要义务。所以说，在确定必要勤勉的共有内容时，以能澄清一般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义务并赋予其实质内容的方式确定普遍适用的程序性义务，将会是一项挑战。出于这一原因，较之具有习惯国际法特征且作为必要勤勉义务的共有内容适用的程序性义务而言，该专题不会寻求确定与国际法具体制度中的必要勤勉有关的任何特定的程序性义务。

28. 所提议的专题不会直接处理国家责任问题。但是，鉴于必要勤勉涉及主要规则，该专题应有助于澄清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之间以及行为义务和结果义务之间的关系。该专题可能还需涵盖与必要勤勉具有相关性的某些解除不法性的情况，例如不可抗力、危难或紧要情况——此类情况中可能会出现国家行为发挥促成作用的问题。⁶³ 但是，总体而言，该专题不会包含必要勤勉与行为和责任归属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果关系和责任分配问题以及国家存在疏忽行为情况下的赔偿问题。上述问题是国家责任制度处理的具体问题，在关于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的研究当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将会与国际法委员会过去的工作重叠。此举还会使委员会曾试图保持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

⁵⁸ 见：国际法协会，*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lin Conference (2004)*；联合国，《关于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人权尽职政策》，2013年，联合国文件A/67/775-S/2013/110。

⁵⁹ 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2011年)，联合国文件A/HRC/17/31。

⁶⁰ Besson, *Due Diligence*, 前注1, 第81-85页。

⁶¹ Ollino,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前注18, 第58-61页。

⁶² 见 Ollino,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前注18, 第232-265页。

⁶³ 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及其评注，第23条第2款(a)项、第24条第2款(a)项和第25条第2款(b)项，《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6-84页；Ollino,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前注18, 第218-225页。

4. 国际法委员会选定专题的标准

29. 所提议的专题将符合委员会选定专题的标准。该专题将符合国际法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纲要，尤其是关于国际关系/责任法的第九节。⁶⁴ 这与委员会早前处理国家责任和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方式是一致的。如第 2 节所述，该专题将顺承并补充委员会 2001 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和 2001 年《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款》相关工作。

30. 任何新专题均应符合委员会选定专题的标准。上述标准是，该专题应：(a) 反映各国在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的需要；(b) 在国家实践方面处于足够成熟的阶段，从而容许进行逐渐发展和编纂；(c) 具体且可行，宜于进行逐渐发展和编纂。委员会还商定，不应局限于传统专题，也应考虑反映出国际法新的发展动态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紧迫关切问题的专题。

31. 就该专题情况而言，委员会选定专题的标准得到了满足。在日趋复杂的世界当中，国际行为体的范围在扩大，威胁在增多，其中包括与技术进步有关的威胁，且对于相互关联的世界当中政府行动和私人行动的有害影响有了越来越多的关切。对于必须决定如何在上述世界中摸索前行的各国而言，该专题具有重要意义。必要勤勉越来越被视为一种用以处理需要注意和监督的情况以防止构成国家责任之行为的工具。

32. 就国家实践而言，该专题也已足够成熟，可予以编纂和逐渐发展。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司法裁决、国家实践和学术著述，可用以推动国际法中必要勤勉问题的相关编纂和逐渐发展工作。必要勤勉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中占有显著地位⁶⁵，且可以预计的是，向国际法院征求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会进一步有助于澄清该项责任的范围。

33. 国际法委员会有关必要勤勉问题的专题，也会对国际法协会的工作起到补充作用。国际法协会就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开展了一项研究，并考虑了适用必要勤勉的国际法各不同领域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理解上的共同之处。⁶⁶ 但是，该项研究是围绕作为一项行为标准的必要勤勉，并没有将其作为科孚海峡案框架内的一项义务来处理。该项研究也没有处理必要勤勉的法律性质问题及其与有关责任的次要规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法学会目前正在仔细研究“适用于全球公域的预防危害规则”，并有意阐明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环境之义务的范围和适用性。⁶⁷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项组成内容，国际法学会将详细阐述相应的必要勤勉标准在遵守上述义务方面对各国有何要求。⁶⁸ 但是，所提议的必要勤勉专题要比国际法学会开展的工作地域范围更广，要比国际法协会开展的工作更系统。

⁶⁴ 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1996年5月6日至7月26日)工作报告》，《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二，第133-136页。

⁶⁵ 海洋法法庭，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问题委员会向海洋法法庭提出的请求，咨询意见，2024年5月21日。

⁶⁶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研究组，前注18。

⁶⁷ 国际法学会，第三委员会，Harm Prevention Rules Applicable to the Global Commons, Editions A. Pedone 出版社，2023年，第104页。

⁶⁸ 同上，第105页。

34. 就逐渐发展和编纂而言，必要勤勉专题既具体又可行。在国家实践和确定国际法规则的辅助手段基础上系统地对其内容进行仔细研究，可有助于阐明该项义务的轮廓。必要勤勉的作用在司法裁决和国家实践当中均得到承认，可以成为一项工具，用以处理与国家活动和应受其管辖或控制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的有害影响以及由此对其他国家权利和利益产生的影响有关的当代问题。该专题还将反映国际法领域新的发展动态以及国际社会的紧迫关切问题。

35. 有关必要勤勉的研究将得益于国际法律专家进行的独立分析和考量。国际法委员会可借助其系统方法，通过就必要勤勉详细阐述一个可供各国用以尽量减轻其行动和应受其管辖或控制者的行动所造成的有害影响的法律框架，使必要勤勉义务更加精确，并赋予其以形式。以此种方式，该专题将帮助各国，为各国提供指导，使其得以履行本国义务，并帮助防患于未然。

36. 最后，委员会务应充分关注国际社会的当代需求。国际法必须跟上不断变化的现实，跟上当今世界日益复杂的形势。在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义务方面，国际法委员会有作用亟待发挥。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的组成和共事会议工作方法，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经由联大与各国建立的密切关系，委员会将能够在必要勤勉问题上对国际法作出有益的贡献。

5. 产物可以采取的形式

37. 该专题的主要目的是编纂国际法中必要勤勉义务的相关实践。鉴于该专题以务实为导向，优选的形式是可用以协助各国履行必要勤勉要求的原则草案。一套有关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的原则，将把必要勤勉义务的基本规范性内容汇集到一起。上述基本规范性内容足具普遍性，且得到广泛支持，可为各国的实际应用充当指南。根据该专题的进展情况，可考虑其他替代形式，例如结论草案。若采用条款草案形式，将与 2001 年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和 2001 年关于跨界损害的条款保持一致，对委员会过去就相互关联的法律问题开展的工作起到补充作用。但是，原则草案是该专题产物的优选形式，因为该专题以务实为导向，且意在拟订具有适度普遍性的建议，以为各国提供指导。

精选参考书目

a. Books

Besson, Samantha, *La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The Pocket Book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 Les livres de poche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vol. 46 (2021).

Besson, Samantha,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Hague Academy Special Editions) (Leiden/Boston: Brill|Nijhoff, 2023).

Blomeyer-Bartenstein, Horst, "Due Diligence" in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1987).

Cabus, Tony Kevin, *The Theory of Due Diligence and the High Seas*, 1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Clapham, Andrew,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f Non-State Actors,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Academy of European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ontreras, José Fernando Lozano, *La noción de debida diligencia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Atelier, 2007).

- Delerue, François, *Cyber Operations and the Principle of Due Dilig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Favre, Jean-Michel, *Essai sur la notion de standard dans la jurisprudence internationale*, Thèse, Université de Paris 1, 1994.
- Foster, Caroline, *Global Regulatory Standards in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Disputes: Regulatory Coherence, Due Regard, and Due Dilig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Krieger, Heike, Anne Peters and Leonhard Kreuzer (eds.), *Due Dilig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Kulesza, Joanna, *Należyta staranność w prawie międzynarodowym* (Łódź: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Łódzkiego, 2013).
- Kulesza, Joanna,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Boston: Brill|Nijhoff, 2016).
- Mantilla Blanco, Sebastián, *Full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onn: Springer, 2019).
- Monnheimer, Maria,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Ollino, Alice,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 Pisillo Mazzeschi, Riccardo, *Due diligence e responsabilità internazionale degli Stati* (Milan: Giuffrè, 1989).
- Societe Francaise pour de Droit International (SFDI)/Sarah Cassella (eds.), *Le standard de due diligence et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Paris : Pedone, 2018).
- Zannas, Pavlos Alexandrou,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s États pour les actes de négligence* (Montreux: Ganguin, 1952).

b. Articles, chapters and policy papers

- Abramovich, Víctor. “Responsabilidad estatal por violencia de género: comentarios sobre el caso “Campo Algodonero” en la Corte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Anuario de Derechos Humanos* 6.167 (2010): 10-5354.
- Alfatlawi, Ahmed and Azhar Al-Fatlawi,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Due Diligence and Notification in Light of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COVID 19 as a Model”, *Alrafidain of Law*, vol. 22(79) (2024), pp. 72–110.
- Bannelier, Karine, “Obligations de diligence dans le cyberspace : qui a peur de la cyber-diligence ?”,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2(2) (2017), pp. 612–665.
- Bannelier, Karine, “Due Diligence as a Cardinal Principle in the Fight against Malicious Cyber Activities” in Antonio Segura Serrano (ed.), *Global Cyber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Routledge, 2024).
- Barnidge, Robert P. “The Due Diligence Princip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vol. 8(1) (2016), pp. 81–121.
- Berkes, Antal, “The Standard of ‘Due Diligence’ as a Result of Interchange betwee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Security Law*, vol. 23(3) (2018), pp. 433–460.
- Besson, Samantha, “La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6 (2021), pp. 15–355.
- Bismuth, Regis, “The Emerging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Due Diligence Responsibi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William Blair, Chiara Zilioli and Christos Gortsos (e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Banking Law in the post COVID-19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330–351.

- Bonnitcha, Jonathan, and Robert McCorquodale, “The Concept of ‘Due Diligence’ in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8(3) (2017), pp. 899–919.
- Bourke-Martignoni, Joanna,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ue Diligence Standard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gainst Violence” in Carin Benninger-Budel (ed.), *Due Dilig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rotect Women from Violence* (Leiden/Boston: Brill/Nijhoff, 2009), pp. 47–60.
- Burgstaller, Markus, and Giorgio Rizzo,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 38(6) (2021), pp. 697–922.
- Campbell, Ellen et al.,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50(2) (2018), pp. 541–604.
- Chinkin, Christine, “The Duty of Due Diligence”, Ad Hoc Committee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 (2010).
- Coco, Antonio and Talita Dias, “Prevent, Respond, Cooperate: States’ Due Diligence Duties vis-à-vis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vol. 11(2) (2020), pp. 218–236.
- Corten, Olivier, “La “complicité” dans le droit de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 un concept inutile ?”,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57 (2011), pp. 57–84.
- Davitti, Daria, “On the Meaning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 Alternative Narrative of Due Diligence”,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vol. 12(2) (2012), pp. 421–453.
- De Brabandere, Eric, “Host States’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yracu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e*, vol. 42(2) (2015), pp. 320–361.
- De Schutter, Olivier and Anita Ramasastry, Mark B. Taylor, Robert C. Thompson,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The Role of States”, *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2012).
- Distefano, Giovanni, and Aymeric Hêche, “L’Organe De Facto Dans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 Curia, Quo Vadis?”,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LXI (2015), pp. 3–33.
- Dupuy, Pierre-Marie, “Dionisio Anzilotti an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1) (1992), pp. 139–148.
- Elorrio, Magdalena García. “Algunas consideraciones sobre las discordancias en torno a la noción de diligencia debida en el proyecto de la CDI sobre responsabilidad por hecho ilícito de los Estados.”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2.1 (2011).
- Espada, Cesáreo Gutiérrez, “La noción de debida diligencia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 59(2) (2007), pp. 904–905.
- Fife, Rolf Einar, “Obligations of ‘Due Regard’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Their Context, Purpose and State Practi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34(1) (2019), pp. 43–55.
- Forteau, Mathias, “The Legal Nature and Content of ‘Due Regard’ Obligations in Recent International Case Law”,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34(1) (2019), pp. 25–42.
- Frey, Barbara, “Due Diligence to Prevent Foreseeable Harm: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genda on Civilian Gun Violence”,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 Policy*, vol. 60(1) (2019), pp. 91–110.
- Gandur, Jean-Claude, “Due diligence: Les derniers maillons de la chaîne”, *Revue de droit uniforme*, vol. 20(4) (2015), pp. 651–655.

García, Gabriel Fernández, “Principio de debida diligencia y violencia de género en la casuística del Tribunal Europeo de Derechos Humanos”, in *Mujer y derecho*, (Astigi, 2020), pp. 89–103.

Hessbruegge, Jan Arn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s of Attribution and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36(4) (2004), pp. 265–306.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Berlin Conference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vol. 1(1) (2004), pp. 221–293.

Katya, Samuel, “The Legal Character of Due Diligence: Standards, Obligations or Both?”, *Central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2022), pp. 33–70.

Kim, Hyun Jung, “Flag State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IUU Fishing”,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2 No. 1 (2015), pp. 65–89 [김현정, 국제법상 불법·비보고·비규제(IUU 어업)에 관한 기국의 의무와 책임, 서울국제법연구 22권 1호]

Koivurova, Timo, “What is the Principle of Due Diligence?” in Jarna Petman, Jan Klabbers (eds.), *Nordic Cosmopolitanism: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Martti Koskenniemi* (Leiden/Boston: Brill|Nijhoff, 2003), pp. 341–349.

Koivurova, Timo and Krittika Singh, “Due Diligenc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König, Doris, “The Elaboration of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as a Mechanism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by Private Actors” in ITLOS (e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to the Rule of Law: 1996–2016* (Leiden/Boston Brill|Nijhoff, 2018), pp. 83–95.

Kulesza, Joanna,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William & Mary Bill Rights Journal*, vol. 30 (2), (2021), pp. 265–289.

Lanovoy, Vladyslav, “Les obligations de diligence requise à la lumière de la jurisprudenc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in *Liber amicorum en l’honneur de professeur Mohamed Bennouna: Souveraineté, sécurité et droits de la personne* (Paris: Pedone, 2023) pp. 129–150.

Lipkina, Nadezhda N. and Dmitry V. Krasikov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 of due diligence in cyberspace” *European Proceedings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2022).

Longobardo, Marco, ‘The Relevance of the Concept of Due Diligence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7 (2019) pp. 44–87.

Malaihollo, Medes,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 Comparative Legal Study of the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Positive Obligations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68 (2021), pp. 121–155.

Malaihollo, Medes, “On Due Diligence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What a Māori World View Can Offer”,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70 (2023), pp. 65–86.

Martin-Ortega, Olga,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for Corporations: From Voluntary Standards to Hard Law at Last?”, *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 vol. 32(1) (2014), pp. 44–74.

Mateus de Albuquerque, Beatriz,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n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 Krzysztof Wojtyczek (eds.), *Judicial Power in a Globalized World: Liber Amicorum Vincent De Gaetano* (Berlin: Springer, 2019), pp. 229–256.

Mbengue, Makane Moïse,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Innovations in Marine Environmental Fact-Finding and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0 (2016), pp. 285–289.

McDonald, Neil, “The Role of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68(4) (2019), pp. 1041–1054.

O’Donoghue, Aoife, “The Exercise of Governance Authority by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The Role of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after Conflict” in Matthew Saul, James Sweeney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st-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45–65.

Oliveira, Jardim, and Thiago Braz, “La diligence due dans la prévention des dommages à l’environnement”, *VII Anuário Brasileir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vol. 2(3) (2012), pp. 205–242.

Ong, David M,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of States in Disputed Maritime Jurisdiction Zones and Prospects for Co-operative Arrangements in the East China Sea Region”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2 (2016) pp. 119–130.

Ouedraogo, Awalou, “La neutralité et l’émergence du concept de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L’affaire de l’Alabama revisité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2) (2011), pp. 307–346.

Ouedraogo, Awalou, “La due dilige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 de la règle de la neutralité au principe général”,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vol. 42(2) (2012), pp. 641–683.

Papayannis, Diego M., “Razonabilidad e incertidumbre en los estándares de diligencia.” *Isonomía* 55 (2021), pp. 61–83.

Peters, Anne, Heike Krieger, Leonhard Kreuzer, “Due Diligence: The Risky Risk Management Tool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9(2) (2020), pp. 121–136.

Piernas, Jorge, “El principio de diligencia debida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su aplicación al contexto cibernético.” *Anales de Derecho*, vol. 41(1) (2024), pp. 66–95.

Pisillo-Mazzeschi, Riccardo, “Form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Harm” in Francesco Francioni, Tullio Scovazzi (ed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Harm* (London: Graham & Trotman, 1991), pp. 15–35.

Pisillo-Mazzeschi, Riccardo, “The Due Diligence Rule and the 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5 (1992), pp. 9–51.

Pizarro Wilson, Carlos. “La culpa como elemento constitutivo del incumplimiento en las obligaciones de medio o de diligencia.” *Revista de derecho (Valparaíso)* 31 (2008): 255-265.

Rheinberger, Brigitte, and Nicola Pain, “The Due Diligence Principle from International to Domestic Law: Applying the Principle in Practic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5 (2018), pp. 81–101.

Roguski, Przemysław,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Cyber Opera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ates’ Views”, *The Hague Program for Cyber Norms Policy Brief* (2020).

Ruggie, John Gerard, and John F Sherman, III, “The Concept of Due Diligence’ in 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 Reply to Johnathan Bonnitcha and Robert McCorquodale”,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8(3) (2017), pp. 921–928.

Samuel, Katja L. H., and Silvia Venier, “The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Engaged in Disaster Management” in Sergey Sayapin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Security Law: A Research Handbook*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22), pp. 527–551.

Schmid, Evelyne, and Ayse Özge Erceis, “The Attribution of Omissions: Due Diligence in Cyberspace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Swis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vol. 33(4) (2023), pp. 577–596.

Schmitt, Michael N., “In Defense of Due Diligence in Cyberspace”, *Yale Law Journal Forum*, vol. 125 (2015), pp. 68–81.

Scott, Richard Mackenzie-Gray, “Due Diligence as a Secondary Rule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2) (2021), pp. 343–372.

Seibert-Fohr, Anja, “From Complicity to Due Diligence: When Do States Incur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Involvement in Serious International Wrongdoing?”,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0 (2017), pp. 667–708.

Seršić, Maja, “Due Diligence: Fault-Based Responsibility or Autonomous Standard?” in Rüdiger Wolfrum, Maja Seršić, Trpimir M. Šošić (ed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Budislav Vukas* (Leiden/Boston: Brill|Nijhoff, 2015), pp. 151–160.

Shackelford, Scott J., Scott Russell, Andreas Kuehn, “Unpack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Cybersecurity Due Diligence: Lessons fro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1) (2016), pp. 1–50.

Simo, Emmanuel, “Réflexions épistémologiques sur l’illicéité résultant de l’incompatibilité du droit interne par rapport au droit international”, *Annuaire canadien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59 (2022), pp. 36–79.

So, Byungchun, “Due Diligence in Prevention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 Focusing on Transnational EIA”,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6 No. 4 (2021), pp. 97–130 (2021) [소병천, “국제환경법의 예방원칙과 상당한 주의 – 초국경 환경영향평가를 중심으로”, 국제법학회논총 66 권 4 호]

Takano, Akiko, “Land-Based Pollution of the Sea and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Globalization* vol. 60 (2017), pp. 92–98.

Takano, Akito,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and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Harm: Cybersecurity Applications”, *MDPI Laws*, vol. 7(4) (2018), pp. 1–12.

Townley, Stephen, “The Rise and Risk in International Law”,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8(2) (2017), pp. 594–646.

Tzevelekos, Vassilis P., “Revisiting the Human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Limits and Potential – Obligations Erga Omnes, Hierarchy of Rules and the Principle of Due Diligence as the Basis for Further Humanisation”, *Erasmus Law Review*, vol. 6(1) (2013), pp. 62–76.

Viñuales, Jorge E.,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 Fine-Grained Cartography” in Heike Krieger, Anne Peters and Leonhard Kreuzer (eds.), *Due Dilig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11–128.

Yotova, Rumiana, “The Principles of Due Diligence and Pre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vol. 75(3) (2016), pp. 445–448.

c. International bodies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Study Group on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First Report*, Duncan French (Chair), Tim Stephens (Rapporteur) (2014).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Study Group on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Second Report*, Duncan French (Chair), Tim Stephens (Rapporteur) (2016).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3rd Commission, Harm Prevention Rules Applicable to the Global Commons, Editions, A. Pedone, 2023.

UN ILC, Yearbook ... (various years).

d. Judicial decisions

Alabama Claims Arbitrati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United Kingdom), Final Award of 15 September 1872, RIAA Vol. XXIX pp.125–134.

Frederick Wipperman Arbitrati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Venezuela), Final Award of 2 September 1890, Moore, History and Digest, vol. 3, pp. 3039–3043.

Affaire des biens britanniques au Maroc espagnol (Espagne contre Royaume Uni) [British Property in Spanish Morocco Arbitration (Spain v. United Kingdom)], Final Award of 1 May 1925, RIAA Vol. II pp. 615–742.

Island of Palmas Arbitration (The Netherlands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nal Award of 4 April 1928, RIAA Vol. II pp. 829–871.

S.S. Lotus (France v. Turkey), Judgment of 7 September 1927, *P.C.I.J. Reports 1927*, Series A No. 10.

William E. Chapman Arbitrati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Final Award of 24 October 1930, RIAA Vol. IV pp. 632–640.

Trail Smelter Arbitrati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Canada), Final Award of 11 March 1941, RIAA Vol. III p. 1938, pp. 1905–1982.

Corfu Channel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Albania), Judgment of 9 April 1949, *I.C.J. Reports (1949)* p. 4.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0* p. 3.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Merits, Judgments, *I.C.J. Reports 1986* p. 14.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96*, p. 226.

The Gabčíkovo-Nagymaros Project, Merits, *I.C.J. Reports 1997*, p. 7.

Case C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Ugand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5*, p. 168.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v. Serbia and Montenegro)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7*, p. 43.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Merits, *I.C.J. Reports 2010*, p. 14.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Merits, *I.C.J. Reports 2015*, p. 665.

Indus Waters Kishenganga Arbitration, Partial Award of 18 February 2013, PCA 2011-01.

Opuz v. Turkey,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pplication no. 33401/02), Judgment, 9 June 2009.

ITLOS,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States Sponsoring Persons and Entities with Respect to Activities in the Area*, Advisory Opinion, 2011.

ITLOS,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 Advisory Opinion, 2015.

ITLOS, *Request Submitted to the Tribunal by the Commission of Small Islands St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dvisory Opinion, 21 May 2024.